

# 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沙武田<sup>1</sup> 寇克红<sup>2</sup>

(1. 敦煌研究院 文献所, 甘肃 兰州 730030;

2. 高台县博物馆, 甘肃 高台 734300)

中图分类号: G353.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11)04-0171-10

为了推动高台魏晋墓和河西历史文化研究,由高台县委、县政府,甘肃省敦煌学会,敦煌研究院文献所、河西学院主办,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省历史学会、兰州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协办,于2010年8月13至15日在甘肃省高台县召开“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韩国、日本等地区四十余家高校及学术机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收到论文64篇,集中展示了学术界近年对高台、河西魏晋墓,河西历史、地理、中西文化交流、石窟考古艺术、民族文化、语言文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 一、河西魏晋墓研究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扬之水研究员《搗鼓考——兼论龟兹舍利盒乐舞图的含义》,考证了高台地埂坡魏晋墓四号墓前室后壁壁画中的搗鼓的源流,其次就1930年出土于库车县以北昭怙离遗址中龟兹舍利盒上的“乐舞图”进行了考证,对早年有学者考证其作为时令的“苏幕遮”这一结论有所质疑,认为此舍利盒上的乐舞图主题是为供养舍利服务,而与作为时令歌舞的“苏幕遮”是不相干的。

收稿日期: 2010-12-05

作者简介: 沙武田(1973-),男,甘肃会宁人。历史学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寇克红(1964-),男,甘肃高台人。馆长,文博馆员,主要从事魏晋墓葬研究。

日本早稻田大学三崎良章教授《从画像砖看高台魏晋墓的特性》，根据高台县画像砖墓的发掘调查活动和当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高台魏晋墓、嘉峪关新城古墓群、酒泉西沟古墓群有共通之处，同时又具有一定独特的个性，相互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

高台博物馆馆长寇克红研究员《高台许三湾前秦墓葬题铭小考》，就高台许三湾墓群中前秦建元十四年砖铭和前秦建元廿年棺板题记内容及图案主题进行了考释，提出自己对这些独特铭文的解释和看法。兰州商学院高启安教授《“椎牛”宰杀方式考索——以嘉峪关墓葬壁画为主》，指出嘉峪关魏晋墓葬有多幅屠牛图，实以椎牛，进而指出河西出现如此集中的多幅椎牛图，是当时河西畜牧经济繁荣、肉类在河西人的食物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反映。日本新泻大学人文学部南北科研究西北班荻美津夫教授《从魏晋五胡时代河西地区的砖画壁画中看到的音乐描写》，对嘉峪关魏晋墓和酒泉魏晋墓砖画、壁画中所描绘的乐器进行了比较性的介绍，以求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音乐史有所补充。

高台县博物馆副馆长赵万钧馆员《高台博物馆藏魏晋彩绘囊小考》，对现藏于高台博物馆的几件魏晋墓出土木器进行了考释，结果认为当为系钟磬架横木龕上之饰，代表一种礼仪。

兰州理工大学李重申教授、博士生丛振《丝绸之路魏晋古墓砖画中的鹰猎小考》，借助于考古学、文化学和体育学的理论基础，对丝绸之路魏晋墓葬彩绘砖画的鹰猎图像进行探讨和研究，考述了鹰猎活动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竞技性，以及鹰猎与习射武、军事训练的关系等，深入地对魏晋墓葬砖画进行了人文反思，展示了画像砖的迷人风采和价值。日本新泻大学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环东亚研究中心内田宏美特任助教《甘肃魏晋墓出土画像砖中的“弓箭”》，通过狩猎图考证出草原与森林山地日常性地进行着使用弓箭的狩猎活动，并进而推测出，魏晋时代河西地区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耕与畜牧，而使用弓箭的狩猎并非主要的谋生手段。日本北村永女士《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的伯牙弹琴图考》，尝试用汉式铜镜对照墙画像进行图像学的解释，考证出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中与很多神兽一起被描绘在照墙上的伯牙，承担着与铜镜中表现的伯牙共通的作用，无疑被认为是具有同样力量的神仙之一。兰州理工大学李金梅教授、硕士生白洁《河西走廊魏晋砖画中的“骑射”小考》，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河西走廊魏晋砖画中反映的骑射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形象进行分析，追溯源流，对研究我国古代马术的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和启示。敦煌研究院殷光明研究员《敦煌出土画像砖综述》，分别就敦煌画像砖的形成与发展，敦煌画像砖的出土与分布，敦煌画像砖的工艺手法及题材特点，敦煌画像砖的文化内涵与敦煌石窟艺术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兰州理工大学李金梅教授《丝绸之路魏晋墓葬画考释》，甘肃省博物馆孔德众馆员《魏晋河西墓室壁画的艺术特色》，通过分析河西魏晋时期的文化背景及墓室壁画概况，点明了河西魏晋壁画墓的艺术特色，继承和发展了汉代的墓室壁画的传统，形象生动传

神，完全摆脱了汉代墓室壁画中略带稚拙的表现方式，线条有丰富的变化，较秦汉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墓室壁画在布局、内容、构图都有其特殊性，且色彩热烈明快，单纯和谐，进而指出河西魏晋壁画墓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添补了河西地区在南北朝佛教壁画艺术方面的空白。

## 二、文献研究

日本樱美林大学人文学系町田隆吉教授《甘肃省高台县出土魏晋十六国汉语文书编年》，分别对高台出土的属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汉语文书按时间顺序作了编年罗列，内容包括文书的题名、释文内容、文献来源出处，资料详细，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大大方便学界研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杨宝玉研究员《敦煌文书与五代时期五台山佛教史研究——以 P. 3931 为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敦煌写本 P. 3931 中僧牒、中印度普化大师巡礼五台山日志、僧牒的再校注和重新释读，分别就两件僧牒主人印度高僧相关内容，颁发者的身份考察，指出可能来自甘州回鹘可汗。又探讨了《中印度普化大师巡礼五台山日志》与五台山崇拜西传的关系，后唐政权中五台山崇拜之间的密切关系。以 P. 3931 为例，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五台山崇拜的历史事实。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吴浩军教授《〈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增补——河西出土墓葬文献研究系列之一》，仿照饶宗颐先生主编《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一书体例，就作者近年所释读酒泉新出土《永嘉五年樊氏镇墓文》接触到的部分资料，细致梳理为 37 条以公布于学界，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许建平教授《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尚书〉写本》，对自 19 世末至今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 7 件《尚书》写本如《大禹谟》《禹贡、甘誓》《说命中》《吕刑》《文侯之命》等作详细介绍、考释，并就部分写本中的俗体字写法进行解读。敦煌研究院文献所张延清博士《高台县博物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考述》，对高台县博物馆藏藏文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等写卷进行细致分析，并就其中藏文题记进行考释，结合敦煌市博物馆藏《十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报废经叶记录，对报废经叶兑换新纸程序进行考证。敦煌研究院文献所勘措吉馆员《武威博物馆藏藏文文献概述》，对武威博物馆藏 4 件吐蕃早期写经，4 块吐蕃木牍，一件丝织品愿文，16 页特殊版本的藏文抄经，1 部手抄本《莲花生传》作了介绍。其中大藏经基本属于《甘珠尔》部，有 4 函刻印的朱砂本《甘珠尔》属绝版。根据函数和抄写纸张格式分析，约有 4 套藏文大藏经，共计 5300 多部，10 万余页（双面），8 千多万字，98% 属手抄本。原来这些文献典籍均供奉于武威各藏传佛教寺院，武威大云寺有藏经阁专门供奉《大藏经》，藏语称之为“甘珠尔拉康”。解放后，文物部门陆续将寺院的藏品收缴到文庙，集中存放。武威考古所黎树科研究员《甘肃武威出土隋王府君墓志铭考释》，就 2005 年 4 月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市凉州区宋家园村甘肃成功学校河西分校基建工地抢救性清理发掘隋代墓葬一座所出土墓志铭作了考释，内容包

括墓志内容,主人身份等关系。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山本孝子博士《有关敦煌僧尼书仪的几个问题》,就敦煌发现的不少写本书仪中所收录僧尼、僧俗之间往来的书札范文,对僧俗之间书札礼仪的不同之处进行了解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钱光胜《敦煌愿文中的地狱神考述》,通过敦煌愿文中佛教地狱的论述和分析,以佛教从道教和民间吸收了什么为视角,对愿文中“土府水官”和“保人可韩”的来源、演变进行了考证,并简要分析了愿文中的冥吏,认为敦煌愿文在考察佛教地狱思想中土化、世俗化进程和民间信仰流变方面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与会学者热烈讨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所博士生张小虎《敦煌算经“九九表”探微》,“九九表”是我国古代数学运算中进行乘除、开方等用的基本运算规则。敦煌遗书手写算经中亦有“九九表”多件。据作者粗略查检,敦煌算经相关“九九表”约12件。本文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从敦煌算经“九九表”中若干有特色的字词、表中出现的记数符号、大写数字,“九九表”的句数与排列顺序等方面作了探讨,揭示敦煌算经“九九表”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及其所透露出的社会信息。

### 三、历史研究

日本埼玉大学小林聪教授《在中国古代礼制、服制史上河西出土文物的特点——以礼制构造的概况和在河西地区的服制传播为中心》,旨在以礼制和服制背景来探讨河西地区礼制和服制的传播及其特点,集中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现象:①汉末以后,以往的礼制知识遭到破坏的同时,官爵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晋在制作新礼制的过程中,服制(特别是朝服制度)是以怎样的形式被再次编制的?②在东晋南朝,西晋的服制是怎样发生着质变的?特别是梁武帝的礼制、官制改革对服制产生了哪些影响。③在五胡、北魏时期,北族(鲜卑等骑马民族)的服饰是怎样渗透中国社会的?据此,中国的服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对北魏的服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④认为北朝后期(北齐、北周)以后,西晋的服制和鲜卑等北方民族的服饰、粟特人等西方服饰的要素相互融合,最终发展成为了唐代完备的“多文化”服制,这一发展过程具体是怎样的呢?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在河西地区朝服制度的渗透”,“包扎‘帻’的意思”两个大问题。

敦煌研究院文献所所长马德研究员《从高台画像砖看4世纪的建康社会》,认为高台画像砖主要表现建康郡的社会风情和历史情景,如果将嘉峪关、敦煌等地的画像砖与高台画像砖结合起来,已经形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艺术系统,用以展现公元4世纪时的整个河西社会。河西学院历史系闫廷亮教授《鞠氏高昌延昌末瘟疫试探》,对高昌地区发生于延昌末年的一次瘟疫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探讨了发生的原因、流行状况,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王晶波教授《史书中的帝王形貌及其

演变》，梳理了历代史书中有关帝王形貌描写的演变过程及特点，结合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讨论了相人术、谶纬迷信及佛教相好观对帝王形貌描写的影响，指出史书从天命神授观出发对帝王进行神话的实质。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黄兆红教授《秦汉时期河西走廊产业结构的变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访问秦汉时期河西走廊产业结构作了分析研究。河西走廊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自汉代以来就被历代中原王朝所重视。汉代经营河西以前，河西走廊主要居住着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部落，他们过着随水草而迁徙的生活，其产业结构是畜牧业经济，而这种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在匈奴统治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汉王朝占据河西以后，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从汉武帝开始，对这一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戍边、开发屯垦、设置郡县。揭开了河西走廊农耕经济发展的序幕。此后，农耕经济的地位在河西走廊确立并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农耕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原有的畜牧业经济窒息，相反在河西走廊农牧经济获得了协调发展，并最终确立了以农耕经济为主，农牧结合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日本龙谷大学讲师中田裕子博士《唐代西州的群牧和马贸易》，对唐代西州有关马牧和贸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兰州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王祥伟、徐晓卉副教授《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财产管理人员的组织形式及连署制度》，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纲管除了传统的三纲（上座、寺主、维那）以外，有的寺院还有寺级僧政、法律、判官等僧官，这些纲管管理寺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管理寺院财务。纲管之外，敦煌寺院中从事财产管理的往往还有直岁、老宿、甚至普通僧众等，他们一并组成了敦煌寺院财务的管理人员。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这些财产管理人员往往组织成“所由”、“团”等形式来进行，并且在相关财产管理中实行连署制度。本文对吐蕃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财产管理人员的组织形式及连署制度进行了考察研究。新疆石河子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杨发鹏《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高僧对江南佛教的贡献》，以佛教文献学基础，考察了十六国时期河西高僧在江南的活动及其影响和贡献。河西学院历史系讲师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妇女生活初论》，以河西魏晋墓出土的妇女形象资料为基础，对这一时期河西妇女的日常生活、民族关系等作了介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所博士生赵小明《敦煌求子巫术考论》，敦煌遗书中关于求子巫术的记载，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唐代敦煌地区民间的求子习俗状况。本文通过敦煌遗书对唐代敦煌地区民间的求子巫术作了考论，首先列举了敦煌遗书中出现 21 种求子巫术，接着对这些巫术的起源与内涵作了考论，最后指出了敦煌遗书所见求子巫术的特点与意义。

#### 四、历史地理研究

日本新泻大学人文学部系主任关尾史郎教授《在高台县境内的古墓群与古代郡县制》一文，细致整理了有关高台县的古墓群数据，并尽为可能的对各个古墓群在魏晋、

五胡时代所处的郡县进行了推定,对研究高台魏晋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高台绿洲历史变迁考》,就高台地区古绿洲的概况,高台古城如骆驼城、黄沙湾城、许三湾城、新墩子城、草沟井城、明海子城等遗址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最后就高台古绿洲的沙漠化问题作了阐述。陕西师范大学李宗俊博士《唐代建康军考》,就唐河西建康军的建置背景、建康军治所两个问题作了研究。认为正是北方的突厥和西南的吐蕃对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威胁严重之时,证圣元年(695)王孝杰在回军途中,由其全盘负责的一次大规模西北军事交通建设,置建康军是其中之一项。其二,建康军所在的位置,正是吐蕃穿越祁连山进出河西的又一必经之地,建康军的设置就是为防御吐蕃进出河西的这一“贼路”所设,唐建康军和祁连戍的故址,皆在唐甘、肃二州间紧靠祁连山水关口以北的东西大道上,前为戍,后为军,彼此呼应,皆为首防吐蕃的北犯而设,因此高台骆驼城当为唐建康军的旧址。

日本学习院大学讲师市来弘志《高台骆驼城马面建筑小考》,对高台骆驼城中马面现状、与城制关系、为什么出现比较少等原因作了研究。河西学院中文系朱瑜章教授《高台县名及河西“台”文化源流考》,主要依据河西方志、诗词等有关文献材料考证辨析了高台县命名的依据,并进而对河西走廊悠久的“台”文化作了追根溯源的考证,认为河西的“高台”、雷台、皇娘娘台等丰富的台文化最早应追溯到上古河西走廊昆仑神话,与轩辕台、西王母瑶台、大禹治水的高台以及简狄瑶台等属于同一形制,有源流关系。西北师范大学敦煌研究所潘春辉副教授《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认为清代河西走廊在水利开发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一些不足与积弊亦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水规不尽完善、水官徇私舞弊、奸民乱法违规、水规执行不力、水利技术落后、森林破坏水源日稀等。诸多积弊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河西走廊水利事业的发展。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再聪教授《花儿盆 青沙岷 迭烈逊》,对黄河沿岸靖远县一带这三个地名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辨。高台博物馆原馆长曹国新先生《骆驼城是清代打在古遗址上的新标记》,对骆驼城废弃原因作了考察,认为与大地震造成的山洪有关。另就现今称名骆驼城的由来进行了考察辨析,认为骆驼城名的由来当与清代以来当地人在此圈养骆驼有关。

## 五、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教授《读固原南郊隋唐史氏家族墓志札记》,对固原史氏的来源,墓志中涉及的几个府兵府问题,固原史氏角色的转换——以史诃丹为例,史索岩家族衰落原因蠡测等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张元林研究员《敦煌藏经洞所出绘画品中的日、月图像研究》,以藏经洞所出的日、月图像为研究对象,对它们的图像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图像来源作一论考,以期通过这样的个案去认识敦煌佛教艺术的多元性和融合性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敦煌在中

西交流史上曾经扮演过的“融汇多元文明”的历史角色。敦煌研究院文献所沙武田研究员《河西李轨大凉政权琐记——兼谈大凉胡人集团对莫高窟洞窟营建之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河西大凉政权时期的考古文物发现、莫高窟的营建、大凉政权的年号等几个问题作了简略之陈述，对于我们认识隋末唐初河西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日本新泻大学岩本笃志助教《北朝隋唐时期的贵石印章和粟特人》，最近中国在城市开发和道路建设的过程中很多古墓被发现，其中有一些是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古墓陪葬品。在贵石上阴刻着图像或者是贵石镶嵌的戒指（以下为“贵石印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针对这些出土的印章，从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仅仅指出很可能是受希腊或是罗马等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具体到这些贵石印章有过一个什么样的传播过程？又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它又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以及社会背景？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整理这些北朝隋唐时期的贵石印章的过程中，撰文证明了这些雕刻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像“萨珊王朝”的图像印章，同时这些印章是通过粟特人带到中国的。结果认为：A 中国华北地区出土的、北朝隋唐时期的贵石印章大部分是萨珊王朝的系列印章，而且大多都是刻印着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像或记号。B 已证明粟特人所使用的印章是突厥领域内粟特人聚居地发掘的，他们在传送文书和运送物品时将这些印章作为封泥使用。C 《文物》杂志所刊载的、山西省太原出土的北齐徐显秀墓中的戒指型贵石印章印面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像“迦约玛特”，同时也证明粟特人对当时的政权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些印章做工精美，与其说重视它的实用性，不如说更重视的是它的装饰性。D 撒马尔罕近郊粟特人城堡中，Kafir Kala 出土的封泥表明粟特人非常频繁的使用印章、印泥，这也成为了解他们生活以及商业活动研究中不可欠缺的资料。因此，类似这些在中亚地区的发掘信息，也应当是中国学术界在粟特人研究中引起足够重视的重要依据。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王玉芳教授《比较视野下的西北古代金银器研究》，全面回顾、梳理西北地区古代金银器研究的成果，此研究对推动西北地域美术研究具有文献参考价值。甘肃联合大学人文学院陈金生教授《两汉西域质子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兼谈质子与中西文化交流》，认为两汉西域质子与敦煌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众多的西域质子经由敦煌而入内地，敦煌是名副其实的一个质子“中转站”。西域质子不仅要在敦煌住宿、补给，而且还要接受地方政府的相关检查。更有质子因种种原因而滞留敦煌，或者因得不到批准而留居敦煌，成为当地居民。由于质子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使他们在文化交流中具有其他人员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从质子的现实表现来看，不少质子虚心学习汉族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力倡导者，回国后仿效汉朝进行政治、文化方面的改革，使先进的中国文化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播，并产生很大影响。同时，质子还把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播到中原地区，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兰州大学郑怡楠《河西高台墓葬中粟特人图像与酒泉胡人聚落——河西高台地埂坡

M4 墓葬壁画为中心》，高台地埂坡 M4 墓葬壁画击鼓图和舞蹈图中共出现了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从长相、发式和服饰都与汉族不同，他们长相高鼻深目，发式为或留或髡，服饰上穿短袖紧身连衣裙，很显然是移居高台的西域地区的外来居民。河西地区从汉代以来就有大量外来居民移居，有来自天山南北诸城邦国家的居民，如龟兹、焉耆、鄯善、于阗人，也有来自于中亚地区的特别是粟特地区的胡人，以及南亚印度、波斯地区的商胡，还可能来自东罗马地区的人，因为高昌以西居民长相基本上为高鼻深目多须，发式为剪发、削发或者髡发，服饰记载各不相同，因此判定高台地埂坡 M4 墓葬壁画击鼓、舞蹈图像人物留下很大一个空间。但是这些人物身份的确定，对研究高台地埂坡墓葬壁画意义重大，特别是通过这些壁画折射出来魏晋时期酒泉郡有粟特聚落存在，酒泉地区也是粟特商胡生活的据点。

## 六、佛教石窟研究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李军博士《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第9窟的建成时间》，莫高窟第9窟的营建与建节于沙州的归义军政权的政争背景密切相关，为学者所关注。第9窟中张承奉所谓检校司徒及使相的称号均系其自称，而非前任节度使索勋所授。根据窟内李氏家族供养人题记的情况，可证洞窟建成于李弘愿被清除之后、李弘定等人被杀之前。再结合节度使张承奉的称号，可以确定该窟应建成于乾宁四年（897）二月至光化元年（898）之间。敦煌研究院文献所赵晓星博士《莫高窟第285窟南壁壁画题材的构成》，莫高窟第285窟开凿于西魏时期，南壁由五百强盗成佛、释迦多宝并坐、宾头卢度跋提长者姊因缘、度恶牛缘，小沙弥守戒自杀因缘、施身闻偈等画面组成。这些画面是如何被组织排列到这一壁面的，经过作者的分析，认为画面是存在内在联系的，主要是为了表达在忏悔之后，修行者会以慈悲为根本，产生思求正法的心理，结合洞窟禅修的主题，进入持戒的阶段，并绘出违戒与守戒的示范。

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姚桂兰所长，兰州大学敦煌所张善庆博士《马蹄寺石窟群千佛洞地神图像研究》，张掖马蹄寺石窟群千佛洞第1窟地神图像与托举型形成鲜明对比，属于供养型图像。填补了中古中国该类图像在5-6世纪发展史上的空白。其图像创作直接受到古代西域地区特别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影响。而凉州译经恰恰为部分图像特征提供了最好的诠释。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秦春梅《马蹄寺石窟群塑像壁画艺术风格》，对马蹄寺石窟群各时代艺术特色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武威市博物馆梁继红《西夏文殊菩萨像唐卡辨析》，亥母洞出土的文殊菩萨像唐卡，反映了西夏时期夏、汉、藏等各民族之间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的交流与融合，是反映这一时期较为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珍贵图像资料。特别是萨迦派和噶举派上师的出现，说明早在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各教派已经在西夏境内传播，并拥有众多信众，形成了深厚的佛教积淀。其后的蒙古贵族之所以信奉藏传佛教萨迦派，并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使西藏顺利纳入元朝统治，原因也在于此。兰州大学敦煌所硕士生魏健鹏《幞头小考——以敦煌壁画为中心》，幞头是中国服饰史上具有很强时代特征的首服之一，前后延续发展了一千多年。敦煌壁画中包含了丰富的幞头形象，涵盖了它产生、发展和兴盛的主要时期。本文将史籍中有关幞头的记载与现在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敦煌壁画中的幞头进行了考察，并借鉴了考古类型学的分类方法，对幞头进行分期分类。通过对幞头式样变迁的探讨，能对石窟壁画的分期断代有所裨益。

## 七、民族研究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富学研究员《唐代回鹘仆固部世系考——以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为中心》，以2009年7月19日蒙古国中央省的扎穆日苏木（Zaamar Sum，位处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在土拉河东岸）的一处墓葬唐代墓志《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君墓志铭并序》为材料，就涉及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作了新的考察，集中考察了仆固氏世系，结果为：仆固世系推定为：歌滥拔延（646归唐）→思蜀→乙突朔野（635-678）→曳勒歌（718充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乙李啜拔（741年任突厥东叶护）→怀恩（？-765）。一个半世纪左右间共历六代，恰合家族子孙平均每20-25年左右发展繁衍一代人的通例。韩国汉阳女子大学金天浩教授《北方游牧民族系和韩国灌肠文化比较》，就中国北方、中亚、东亚等广大地域内游牧民族的灌肠文化和韩国进行了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李怀顺教授《河西魏晋墓室少数民族形象初探》，以河西魏晋墓出土人物形象为主要材料，就其中涉及少数民族的形象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中有羌、鲜卑族、九姓胡人等民族人物。并指出众多的少数民族形象与当时民族融合的状况是一致的，各民族共同开发河西走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西北师范大学冯玉雷教授《甘青地区羌人“引路羊”葬俗遗存考》，本文考察高台县博物馆在骆驼城墓群、许三湾等地墓葬考古资料，结合流传在甘肃民间丧葬风俗“领羊”的仪式、文化结构、审美意向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同时，与羌族图腾、文化习俗等相比较，最后得出“领羊”是古老羌族文化在西北地区遗存的结论。同时指出传世文献之外的古代实物与图像资料因其凝聚古人最为真实可感的文化精神与思想情感，对研究古代文化及民俗现象具有独特的视觉说服力。肃南博物馆唐延青馆长《东部地区裕固族已婚妇女头面》，裕固族是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各部落服饰各具特色，内涵丰富，本文就东部地区已婚妇女的头面进行全面介绍，展现其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

## 八、敦煌学史、语言文学研究

甘肃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颜廷亮研究员《敦煌学史随笔：敦煌学史上的第一篇论

文》，就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发表的具体时间作了详细的辨析，考证结果指出罗氏该文最早发表于于右任创办的“竖三民”《民呼》《民吁》《民立》之第二种《民吁日报》，具体时间是1909年11月1日，确为敦煌学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具体写成早于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发表于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燕尘》杂志第2年第11期之《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

兰州大学敦煌所伏俊琰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朱利华《敦煌本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的历史和文学价值》，敦煌遗书P.2555写卷中的《怀素师草书歌》一诗，抒写了作者对唐代大书法家怀素草书艺术的高度赞赏，本文以此诗为基础，首先考证怀素的生平及创作，再次分析了本诗的文学价值，认为当是一首颇具鉴赏价值的咏书诗。

## 九、其他

兰州大学敦煌所博士生赵晓芳《吐鲁番学文献数字化刍议》，文章对吐鲁番学文献数字化的必要性和积极影响进行了充分论证，并论述了建设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四个方面。甘肃省肃南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安玉俊《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发展途径思考》，裕固族是我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也是甘肃省特有的3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生活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据2001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总人口为1.37万，其中9778人生活在肃南县。裕固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它和曾于公元8世纪在蒙古高原推翻突厥汗国而建立回纥汗国的回纥（后改汉文名称为回鹘）以及由漠北迁到河西走廊的回鹘由密切关系。现今的裕固族是以古代回鹘人的一支——黄头回鹘为主体，融合蒙、藏等民族形成的。本文就涉及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容及现状，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保护发展的思路，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途径的思考等问题谈了作者自己的看法。甘肃省张掖市委党校安惠娟《裕固族文化保护与发展问题研究——基于现代化市场化背景的调查》，指出在现代化、市场化潮流的侵袭下，裕固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急剧变革，语言、习俗消失速度加快，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也处在传承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必须从政策入手，政府主导，社会化为依托积极利用现代技术，加快建立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实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张掖电视台赵国鹏《影视人类学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中的作用——以张掖市为例》，以张掖为例，谈了影视人类学在保护文化多样性过程中的作用。

作为以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由于研究地域的独特性，涉及学科门类较多，一直成为限制相关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瓶颈。此次研讨会的参会学者，利用各自在相关领域学术特长，对魏晋墓、河西历史文化，及其相互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我们相信，本次专题会议召开的召开，将成为这一领域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